

密令来自中南海

九大风云录

文化大革命纪实

系列



为止这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
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大型纪实文学

远方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9 4775 9

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

● 师东兵 ● 文集



执行编辑:蔡文辉 李丹宏

丛书策划:吴欣欣 尚士伟

封面设计:文思思 向 阳

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

师东兵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华山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30印张 字数300万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95—272—2/R·25 印数1—1000套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九大”召开期间这种庆祝游行队伍几乎天天都有。



“九大”四月二十四日全体会议上，投票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左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图为会议会场。





林彪在“九大”作政治报告。陈伯达和张春桥分别搞了两个版本的政治报告，但毛泽东选中张的版本。林彪作政治报告时是第一次见到张的版本。



“九大”代表进入会场，左五、左六分别为耿飏、方毅。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解放军空军部队（一九六七年）



林彪在一九五九年接任国防部长后，对军权抓得很紧。图为一个演出场地，可见林彪题词的宣传牌。（一九六八年）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一些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和林彪商议作出的。（一九六八年十月）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都要林彪讲话，以提高他的威信，图中右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一九六六年八月）



杨成武（左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北京。右三为叶剑英。



杨成武的署名文章发表后，“大树特树”一词风行一时，图为一九六七年十月解放军装甲兵机关的集会，右上角可见“大树特树”的标语。



解放军空军政委余立金（右一），一九六六年。



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傅崇碧（一九六七年）

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他是林彪手下的一员大将，迫
害杨、余、傅的急先锋。
（一九六九年）





“九大”四月十四日下午全体大会上，按先后次序发言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总参谋长黄永胜及工人代表、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农民代表、大寨的陈永贵，解放军代表、珍宝岛英雄孙玉国，妇女代表、劳模尉凤英和被“解放”的干部代表纪登奎。



中共“九大”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图为大会主席台，前排以毛泽东为中心，坐在他左边的被称为“左”派，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的被称为“右”派，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毛泽东在“九大”上讲话，前排左起为：董必武、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十年风雨回首看

“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序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旷古未有的浩劫，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世界史上亦是绝无仅有。“文革”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恐怕是没有笔墨可以形容；它的疯狂，它的恐怖，它的激进，它的愚盲，它的滑稽，亦只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洗礼”的人才能有深切的感受。

廿多载时光流逝，“文革”的一页早已记入历史的长卷。泪痕已抹干，血迹已擦拭，红彤彤的“革命标语”亦早已被改革开放的新口号所覆盖，但是中华民族永难忘记那惨痛的一幕，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给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大倒退，终于令他的子民百姓尝到了苦果。

做为教训，有必要将“文革”的实况记录在案，供后人借鉴；做为历史，更有必要将“文革”的秘史

详加留存，对世人有所交代。因此，完成一部富有文学可读性的“文革”纪实著作，供人去了解去反思，便成为一个历史的召唤。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大陆出版的反映文革的作品如雨后春笋，数量不菲。但多囿于表现受残害者的“伤痕文学”，真正从中高层政治斗争的角度去揭露文革内幕的作品，仍付阙如。本部“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恰是从这一层面补回了上述缺憾，从中共“政坛的最高层揭示那段历史的真相”。

本书的作者凭其多年所积累的资料，及对某些当事人的第一手采访，写出了这部卷帙繁浩的巨著，把中国现代历史中这惨痛而却十分重要的一段史实，从其特别的角度展示给读者。“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全书十一册，洋洋二百余万言，从文革序幕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写起，直至华国锋、叶剑英策动政变，把炙手可热的江、王、张、姚“四人帮”擒拿归案，横跨十二年，对历史作出他的褒贬评价。若干年后，即使完全不知“文革”为何物的读者，亦能从书中认识这段独特的历史。以此而论，本部系列的价值，已远超出它的文学范畴。

陈玉书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香港

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

(自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在神州大地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的真实录。这类题材的作品，人们见得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写的是普通百姓以及中下层人士的命运。而我的笔锋向，却是当时中国政坛的最高层。我认为，不从政坛的高层揭示那段历史的真相，也许人们很难弄清那场“文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多年来一直搜集这方面资料，遍访当事人，包括最高决策层核心圈中遭受各种运的那些曾显赫一时的人物……

历史，往往和人们开玩笑，你本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神使鬼差地偏偏走入到那个屋子。我的采访对象们，不管其当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面对今日的结局却都是感慨万千。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留下的不仅是他们的反思，也是所有人的思考，我们的子孙后代们也要继续思考下去。

我有这样一种信念，真实地揭示事件的真相，如实地剖析各种角色的灵魂，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作家的天职。我们讲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中包括在历史的真相面前

作家和研究者们的权利。我之所以选择纪实文学的方式来再现那场浩劫，也正是为了尽我作家的天职，同曾经充斥文坛的某些以庸俗、荒谬、流言为内容的所谓作品划清界限，以便正本清源。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作品就不会有谬误不当之处，而只不过表明了我自己的追求和态度。

曾几何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人罩上种种光圈，捧到耸入云霄的高度。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时间的推移，那场“反修防修的壮举”又逐渐跌落，成为“一场浩劫”和“罪恶的发源地”。在作家的眼里，一切描写对象均是身外的客体，都需要用剖析的态度加以审视和再现。尤其重要的是：历对十年的春秋岁月，无论伟人、英雄，还是小丑恶棍以及大批的平头百姓，都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表演，斑斑陈迹，多少血泪！一位耆人说得好：“把那惊心动魄的岁月如实写下来，不用任何雕琢，就是一部好小说。”

然而，我却觉得笔头沉重。

我不想用自己的笔锋去作人为的贬褒，因为他们的行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只想选择那些历史场而再现对代风云，于是一口气写了这套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丛书。这套书的书名分别是：《山雨欲来》；《风骤京都》；《风暴与逆流》；《序幕从钓鱼台拉开》；《武汉·钓鱼台·毛家湾》；《毛泽东面临选择》；《密令来自中南海》；《九大风云录》；《庐山雾》；《梦破沙丘》和《决定中国命运的廿八天》。

我的采访对象们以及历史上的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他们或许是怀着崇高的愿望、良好的目的去写自己的历史

的，但完成的历史却和他们的出发点相去甚远或者相反。于是，有人感到了恐惧，有人便想歪曲某些情节，有人就要粉饰他们的过失，这就发生了种种篡改历史的荒唐事，有人甚至会对着镜子里的他发出病态的叫喊：“这不是我！这不是我！”……

然而，历史绝不是可以随意捏弄的面团，也不是能够凭武力、强权或金钱去奸污的少女。历史是无情的法官，始终要公正地判决人类社会中的是非曲直；历史如咆哮着的滚滚巨浪，会干干净净地冲刷掉一切涂脂抹粉或划黑的痕迹；历史有时又像沉睡的猛虎，闭眼时容忍蠢人拔须，睁开环眼后将吞下铤而走险的挑战者……

面对历史这面镜子，善于沉思和总结经验的人会成为强者；敢于正视自己的人不愧为英雄本色；而只有愚不可及的蠢人才企图隐藏，躲避，封锁这面无情而又有情的明镜。

但是，我要说；我不是写历史教科书，而是创作文学作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与事情，是纪实的而不是虚构的，又是渗透着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感情的艺术塑像。我不希望读者离开这个范畴去作衡意。而只是乞求读者们用各种眼光或角度从作品中再透视生活。这大概就是文学创作同其它什么行业的区别所在。

当你翻开这部丛书时，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的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政治大风暴好像又呼啸在你的身边。你眼见着一批又一批的政治角色一夜之间爆红，成为权倾朝野的当代诸侯，转眼间他们便身败名裂，成为神州大地上人人唾弃的垃圾；你刚刚听到人们祝愿

“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祷词，很快又闻到了他丧身黄沙、粉身碎骨的腥烟。一群群政治演员过客般地登台显耀，最后的结局不是可笑、可惜，便是令人痛惜可怜。给我们留下的则是一串又一串人生的沉思或启示。透过层层帷幕，你看到毛泽东秘密前往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以及张春桥、江青等人，以修改他的九篇文章之名，筹谋批判《海瑞罢官》，同彭真、陆定一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核心人物巧妙周旋，终于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后，一个又一个的重大事件仿佛把人们引入深奥莫测的迷宫，连串的充满戏剧性的紧张情节，比起小说家笔下的惊险故事或许更加慑人心魄和耐人寻味。这都不是作者的功劳，而是历史事实本身的魅力。直到毛泽东咽下最后一口气，叶剑英、华国锋设计逮捕江青、张春桥等人后，读者们才能轻轻地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

这部书用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向你展示了昨天发生过的事情，而把许许多多的问号和答案留给读者自己去寻找。不同的人们从这部二百万言的作品中寻到的启示和联想也是不相同的。由于作者手头资料和采访对象的所限，一定会有许多难以尽善尽美之处，我想读者们是会予以谅解的。

我最后想重申的一句话是：这是纪实文学，而不是历史教科书。

师东兵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于广州